

· 文献学苑 ·

## 谱牒资料的社会意义及文化价值刍议

王云庆 刘振华 ( 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山东济南 250100)

摘要: 随着谱牒研究重新成为文化研究热点, 搞好谱牒资料的开发利用工作成为当前的紧迫任务, 而如何正确、全面地认识谱牒资料的价值则是开发利用工作的首要前提和基础。文章分别从社会意义、文化价值两个方面分析了谱牒资料的独特性和重要性。

关键词: 谱牒资料 社会意义 学术价值 精神价值

中图分类号: G25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6938(2007)05-0129-05

### The Social and Cultural Value of Family Tree

Wang yunqing Liu Zhenhua ( College of History and Culture, Shandong University, Jinan, Shandong, 250100)

Abstract: In the last years, the references about family trees became a heat topic in cultural studies. In this paper the author analyzes the social and cultural value of the references of family trees.

Key words: references of family tree; social value; academic value; spiritual value

CLC number: G256

Document code: A

Article ID: 1003-6938(2007)05-0129-05

谱牒是家族记载氏族或宗族世系的档案资料, 又名家乘, 包括族谱、宗谱、家谱。谱牒作为正史的补充材料, 是人类社会文化活动的原始记录, 它广泛涉及到一个家族的发展历史、理想模式、价值标准、经济状况、礼仪习俗、文化层次等等, 其形式和内容集中了社会学、历史学、档案学和文化人类学等学科的要旨, 被誉为“传统文化的综合教科书”。迄今为止, 还未发现有哪种档案资料比谱牒的历史更悠久, 影响面更广。从商代到民国, 从帝王将相到黎民百姓, 从城市到乡野, 从汉族到众多少数民族, 谱牒资料所影响到的深度和广度几乎使其成为中国古代的一种全民性文化运动。

近年来, 谱牒和谱牒学研究在大陆重新成为文化研究热点, 各类谱牒资料收藏机构和研究人员展开了大量细致的研究工作。上海图书馆编纂的《中国家谱总目》集结全球华人的家族谱达 60921 份之多, 工程浩大, 历经 5 年, 即将问世。本文拟从客观、主观两个方面入手, 探讨谱牒资料的社会意义和文化价值。就谱牒资料的社会意义来说, 又可从宏观上——谱牒与社会政治之间的依附、反射关系以及微观上——谱牒对于社会个体、群体所产生的认同感、约束力两方面分析; 就其文

化价值来说, 则可从学术研究作用及精神纽带功能两方面入手。

#### 一 谱牒资料的社会意义

任何一种文化现象的产生必然依托于特定的社会政治环境, 同时作为政治在文化层面上的反映, 反过来再作用于特定的社会个体、社会群体。以下从宏观上、微观上分析谱牒资料的产生、发展、兴盛、衰落等一系列历史过程与社会政治环境之间的关系及其作为一种政治工具对社会个体和群体所产生的约束力、影响力。

(一) 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指出, 谱牒的性质属于历史范畴。事实上, 中国的谱牒资料从古至今始终与其功能共生共存, 在某些时期甚至是政治需要的直接产物。血缘宗族关系是封建宗法制度的基础, 而谱牒作为血缘宗族关系的记录载体, 自然而然地具有了政治意义。“辨世系”, “序昭穆”, 始终是历代修谱者的原始动机和谱牒资料的实际功能。

根据政治功能的不同, 中国谱牒资料的发展可以晚唐五

代为界线划分为前后两个阶段。早在先秦时期，一些史籍的编纂就已经大量地利用了当时的谱牒资料。司马迁在《史记》中所用的相当一部分材料即取材于谱牒，“维三代尚矣，年纪不可靠，盖取之谱牒旧闻”，且根据其世系的贵贱，分别将帝王将相至布衣书生各色人物的传记归为“本纪”、“世家”、“列传”三个等级。秦朝的统治时间短，尚未建立起完备的选官制度，因此谱牒的政治功能尚不能发挥出来。到汉代，任官者多为功臣外戚子弟，因此许多豪门望族便凭借谱牒记载炫耀门第，坐取公卿。魏晋南北朝时期，谱牒的编修达到了巅峰极盛状态，皆因此时的选官制度——九品中正制强调士庶出身之别，只有高贵的血统方可跻身仕途，因此编修谱牒自然而然成为仕途之路的敲门砖。《新唐书·柳冲传》记录谱牒的作用时说：“于时有司举选，必稽谱籍，而考其真伪，故官有世胄，谱有世官。”可以说谱牒的政治功能，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发挥得最为淋漓尽致。并且此时谱牒的修撰具有了明显的政府化倾向，谱牒已不仅仅影响到士族的利益，而且与国家的政治稳定、赋税收入的多少及服役人数的多寡都密切相关。

如果说谱牒以官修为主、服务于中央政治、政治色彩强烈是唐五代之前谱牒修撰的最大特点，那么谱牒私修、服务于民间地方、维系血缘宗族色彩强烈，则是宋元明清时期谱牒修撰的主要特点，是为谱牒资料发展的后一阶段。这一转变是因为唐代门阀制度开始衰落，特别是五代之后，由于“取士不问家世”，谱牒以往作为士族政治的档案书的身份自然也一落千丈，其政治功能逐渐淡出了历史舞台。值得一提的是唐代由唐太宗发起编修了一部具有通国氏族谱性质的《氏族志》，表面维护士族的利益，重视谱牒的意义，实则借重编氏族谱之机打击原北朝的旧士族势力，同时抬高当朝官吏的家族地位，缩小士庶之别。在这一场政治角斗中，谱牒是作为一种政治工具，但同时也是被打击的对象，因为谱牒的政治价值在其中明升暗降，并且从此随着科举的兴起、官制的开放而与政治逐渐脱钩。尤其到宋代，理学之风兴起，理学家们将孝悌等伦理观念渗透到谱牒文化之中以推行其教化理想。于是敬宗法族取代了政治角逐成为宋以来私家修谱者的基本宗旨，也是最终目的。到明代，朝廷允许民间祭祀始祖，这为宗族的联宗提供了良好的契机，谱牒的功能在以前的基础上扩展到全面管理宗族，成为带有明显的地域性、自闭性的宗族内部经典。由于“新儒学”思想的复兴，儒家思想大量入驻谱牒，明末清初的“经世致用”思潮更使得谱牒反映出强烈的致用愿望。为突出其实用性，许多修谱者纷纷在谱牒中攀附名人显贵，对外可抬高宗族的地位和声望，对内也可对本族进行激励教化。同时由于社会经济发展进入了新的阶

段，地方宗族势力逐渐强大，谱牒在维系宗族内部团结、巩固宗族势力方面的作用更加凸现。

综合谱牒资料在中国历史各个时期的发展状况，可以总结出一点，即其兴衰变化始终是与社会政治大时局的变迁紧密相连的，它是政治的产物，是政治的工具，也是政治的一面镜子。由政治而生，为政治所用，是其最现实的社会意义所在。

(二) 谱牒是政治的反射，继而再把这种政治色彩投射到社会个体、社会群体之上，这便是其社会意义具体化的表现和在微观上的反映。

由上所述，谱牒的政治功能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发挥得最为淋漓尽致，因此我们可以截取这一富有典型意义的历史时期来考察谱牒对人们生活各方面的影响。<sup>[1]</sup>当时门阀士族制度的主要内容是在门阀士族内部选拔官吏和相互通婚。郑樵在《通志》中记载“官之选举，必由于簿状；家之婚姻，必由于谱系”，人们的仕途、婚姻这人生两大头等要事都要由谱牒所掌握。先谈选官。对于选官者来说，必须对全国或本州郡的士族情况了如指掌，否则很可能会因混淆上品和寒门而出错，因此不熟悉谱牒的人是不可能当吏部尚书，乃至全国各级负责选拔人才的官员的。如南齐时，齐武帝拟用萧鸾为吏部尚书，王晏反对说，鸾不熟悉谱牒，恐不可居此官。齐武帝只得作罢。对于备选者来说，谱牒的意义更是非同寻常，许多庶族为了打通仕途之路，纷纷采用合族和通谱的方法以跻身士族之列，即利用金钱买通同姓士族中的某些人，与之合为一族，继而将自己的家族加入到士族的谱牒中去。如宋时刘延孙为彭城大士族，而宋皇帝刘氏虽然也出身彭城，但实属庶族。为攀上士族，宋文帝无奈之下请求与刘延孙合族。此为皇族与士族之间的公开合族，而民间一般的合族通谱，除了上面提到的要先买通同姓士族之外，还要买通撰修谱牒的官员，否则就不能合法化。买谱、卖谱本非法之事，但却不绝于史。更有伪造宗族谱牒以求蒙混应选的，“昨日卑细，今日便成士流。”

再谈婚姻。通婚的姻家如果不是世家之好，而是不熟悉的家族，先查谱牒以免“婚宦失类”就很必要了。尤其在发生婚姻纠纷时，谱牒更是解决纠纷的根据。士族为了维持谱系的“纯洁性”及自身高贵的社会地位，绝不与庶族联姻；即使在士族内部，通婚也有严格的界限，如北方侨姓士族王谢袁萧等即不与南方土著士族顾陆朱张通婚，可见谱牒对婚姻的参考作用之重要是不言而喻的。这种情况一直维持到南北朝末年，到了隋唐，士族在任官方面的特权逐渐消失了，但高门之间通婚的惯例却一直延续了下去。

除选官和婚姻外，谱牒还是当时社会征发徭役的重要依据。南北朝时期，士族作为社会的最高阶层是不服差役的；庶

族显然无此特权,若想逃避差役之苦,只有冒充士族一法。利之所在,庶族纷纷冒险采取行动,顶着被处以死罪的危险“改注籍状,诈入仕流”,以致当时逃避差役的现象十分严重。

在日常生活中,因谱牒而造成的士庶之别也表现得十分明显。士族与寒门完全不相往来,“流品之人视寒素之子,轻若仆隶,易如草芥,曾不以为伍。”即使庶族者官职上升到贵戚近臣的地位,如果“不自量力”地去拜访士族,士族根本不以礼相待。若庶族更进一步想因官高而升入士族,即使皇帝答应了,士族也会因“辱没门风”而拒绝,那么一切只得作罢。重视家讳就是士族优越的社会地位的一种表现形式,在士族面前必须避免说出其祖先的各种名讳,并且要用其他语言来代替,否则便是大不敬。避免触及他人家讳的最好办法莫过于熟悉谱牒,据载刘宋大臣王弘熟读谱书,“日对千客,不犯一人之讳。”

由于谱牒对于社会每一个体、群体所具有的重要意义,魏晋南北朝时期修谱风之盛,真可以说是达到了“人尚谱系之学,家有谱系之书”。再回到宏观层面上来说,其着眼点始终是社会需要和政治需要,社会个体、群体在此间的所有活动,都只不过是这个大动机背后的支撑组成和表面的形式体现。这些具体的表现和上一小节所分析的时局背景相结合,便显现出了谱牒资料所具有的社会现实意义,即可以将它比喻成一面镜子,社会政治现实在它上面得到了映射,同时又被它投射到了社会个体行为上,从而散发出它的影响力和约束力。

## 二 谱牒资料的文化价值

如果说谱牒资料的社会意义更多地停留在现实层面,即在当时当世的影响,那么其文化价值则更多地体现在它作为一种宝贵的文化遗产给后世后人带来的影响。这种影响又可分为两个方面,即学术价值和精神价值。以下分别论述。

### (一) 谱牒资料的学术价值

#### 1 谱牒资料的史料凭证价值

国有史,方有志,家有谱。谱牒,与方志、正史构成了中华民族历史学的三大支柱。著名史学家顾颉刚先生曾经说过:“我国历史资料浩如烟海,但尚有两个金矿未曾开发,一为方志,一为族谱。”谱牒作为一种记载历史的档案载体,与史学的关系最为密切。在这里,它发挥的是一种史料凭证作用。在文史研究中,史料的重要性是显而易见的,谱牒中保存的大量原始资料,正可以作为史学的基本工具。历朝史书大多有“表”,即可视为由谱牒而产生的一种史籍变体。从此谱牒不仅是维系封建政治权力结构的工具,而且也成为了一种撰述、研究历史的方式。这里的历史是个广义的概念,包括传统史学以及史学

的各个分支如经济史、社会史、移民史、民俗史、历史人口学、地方史志等。

传统史学研究:司马迁作为中国古代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史学大家,首次把谱牒资料与民间口头传闻相印证,并与已有的史学成果即《春秋》相参引,从而在中国的传统史学中首先使用了一种全新的史料——谱牒,同时也创立了一种前无古人的新史学——纪传体通史。这是对于编史者而言,对于今天的历史研究者,谱牒的史料档案价值更不可忽视。人是历史的创造者,谱牒资料中关于人物家世的记载正是正史之外的有益补充,如皇帝封赠的诰命、敕命、墓志和碑文,甚至工笔画像等,都可以证史和补史,有很高的史料价值。<sup>[2]</sup>

谱牒资料与经济史研究:族产是宗族存在的经济基础,谱牒中对族产的记载占有相当篇幅,如对祠田、坟田、义田、义庄、族祠、坟茔、山林等私家财产的数量、形成、经营、收支状况均有详细记载。谱牒档案中所记载的族产形成过程中的房契、地契,可用以研究古代的土地交易关系;对于经营收支情况的记载,则是研究古代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珍贵资料。<sup>[3]</sup>

谱牒资料与社会史研究:家族是社会的基本细胞,作为家族档案的谱牒无疑是社会史研究的重要史料。谱牒中记载了家族的家庭教育、科举中第、技艺诗文以及该家族的组织系统、族规、婚丧礼仪制度等,其具体、详细的程度是其他史料无可比拟的。但同时也应当看到,一般的谱牒无不扬善隐恶、夸大溢美,甚至移花接木、假冒附会,在利用时不可一味轻信,必须结合当时当地的历史实际。<sup>[3]</sup>

谱牒资料与移民史研究:每一种谱牒一般都详细记载了先辈进行迁移的时间、地点及缘由,比较完整地反映了该家族迁移的历史。这些可能是一些自发的、小规模移民的唯一文字记载,也可能是一些官方发起的、大规模移民的历史缩影。对于此类大型迁移,正史中往往缺少具体而详细的记述,但若能集中若干份有关于同一次迁移的谱牒资料,就可以作出更具体可靠的分析。

谱牒资料与民俗史研究:许多谱牒对当地的民俗风情都有所记载。通过各家的服饰、饮食、居住、生产、婚丧、节庆、礼仪等生活习俗,可以了解并还原一个时期、一个地区的真实历史面貌,这些有关普通百姓日常生活的史料,同样也是官史中往往不予记载,而在谱牒资料中却详细记述的,原汁原味从而更见其可贵。

谱牒资料与历史人口学研究:谱牒的核心是世系,每一部家谱都用连线、图谱或横竖表格的形式,将一姓一族的始祖及其以下各世子孙上下左右地布列起来,给人一览便知的清晰印象,并且完整的谱牒应登录该家族全部成员的姓名、生卒年月日、婚姻状况、子嗣状况等,据此可以整理出这些人口的平

均寿命、出生率、死亡率、性别比等一些现代人口统计学所必需的基本数据。与官方的户口资料相比,这些统计往往更加完整、真实。

谱牒资料与地方史志研究:我国以前乡村一级的档案很少,谱牒中记载的大量地方乡村史内容正好弥补了这方面的欠缺。地方编史修志无论用何种体例,人物列传是必不可少的,而谱牒对本家本族的名宦乡贤均有传记或事迹介绍,是编史修志的第一手材料。同时谱牒的材料来源多为当事人的手记或口述,或当时人的记述与追述,较之其他材料,可靠性高出很多。而史料真实性和准确性正是衡量史志价值的重要尺度,可见谱牒资料对于地方编史修志的重要性。

综上所述,谱牒资料在历史研究中的作用,可以参史之讹,补史之遗,为我们更好地认识历史提供了依据和凭证。正如史学家钱大昕所言:“谱系之学,史学也”,“直而不污,信而有征,故一家之书与国史相表里焉。”

## 2 谱牒资料的文化艺术价值

人们习惯将学术三分为义理、考据、辞章,即真、善、美三方面。如果说谱牒的史料凭证作用是为“求真”,“求善”,其文化艺术价值则应为“求美”。

一直以来,由于谱牒作为档案史料所具有的凭证价值比较直观,使得人们往往忽略了其文化艺术价值。谱牒资料中艺文部分所收录的作品往往不见于一般的选集,且由于谱牒对于一些名人往往不仅辑录作品,还摹刻手迹,因而谱牒中的艺文部分往往具有独特的艺术价值和审美价值。<sup>[4]</sup>如《严庄孙氏家乘》,由于该谱牒作者与唐伯虎、祝枝山等人交游甚厚,故而其中辑录了很多唐、祝的佚作。另外,开发谱牒资源可以为解决艺术史上一些存而未决、含混模糊的问题提供线索或取得旁证,并且可能从中进一步提炼出有价值的见解。以我国的园林研究为例,明代时,园林是拥有土地的缙绅文人们用于“归隐于市”的清雅居所,文征明是其中的典型代表。从文氏的族谱中可以知道,文征明并非如后人所传闻般穷困潦倒,相反却是富贾一方,文氏家族以土地为经济来源收取地租并在土地上建造园林。知道了这些,我们就可以对文征明的诗词书画中所描绘的园林有了真正的了解。毕竟每一个艺术家都是生活在一定的具体的社会环境之中,其作品必然是某种特定场合之下的情感反映,谱牒资料正是这种知人论世、了解艺术家创作背景的好工具。另外文氏族谱中还记有园林的大小、方位、结构、外貌、风水观念等种种信息,可以使研究者进而了解到明代苏州地区盆景、园林与当时山水画的内在联系。

### (二) 谱牒资料的精神价值

谱牒资料在它特有的血缘认同光环笼罩下,有效地使中国传统宗法文化的精神渗透到了每一个成员的心理意识之

中,从而影响着中华民族整理文化心理的形成与发展,其精神层面的意义非同小可。

谱牒的精神价值主要可分为对内和对外两个方面。对内可让普天之下的炎黄子孙找到“知其所从来,识其今所在”的历史感和归属感,并进而追求对于民族和国家的认同感和责任感;对外则可促进海外认祖寻亲的联谊工作,以民族凝聚力团结全世界的华人。

谱牒资料对内的精神功用主要是对国人归属感、责任感的强化。首先是归属感。中国远古时期的宗法制使得宗法血缘的基本观念深入人心并贯穿了几千年的历史延续至今。在这种宗法血缘观念下产生的谱牒,首要任务就是用文字的形式把血缘集团内的人际关系物化成为明了的关系网,使世世代代的成员都能准确地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这个人际网络强调人与祖先的同根相连,强调“宗”和“同”的观念,即强调血统的正宗、高贵、同一、永久。谱牒资料正是通过对谱系的记载,不断向血缘集团内的成员强化这些观念,从而在无形之中塑造着人们“归宗认同”的文化心理,并进而直接增强了中华民族的向心力。<sup>[5]</sup>

其次为责任感。“忠信孝悌”是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的核心内容,谱牒在传递这些伦理道德、培养国人于家、于国的责任感方面所起到的教化作用是不可估量的。<sup>[6]</sup>台湾学者陈捷认为谱牒“有着睦族治乡与阐扬伦理的特殊效能,六经的微言,子史的奥义,尽在其中。”谱牒宣扬了传统的忠孝观、亲睦观、节烈观等等,如“忠君孝亲”,“讲信修睦”,“礼之用,和为贵”,“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等等,这些信条一直被古往今来的仁人志士所推崇,是民族精神的灵魂所在。另外,谱牒也宣扬了一些传统价值观如尊贤、崇儒、敦本、勤俭、还报等。尊贤,即尊崇家族内部享有功名的贤者,树立为家族典范;崇儒,即尊奉儒家“内圣外王”的理想人格以及不断进取的入世精神,强调教育,重视科举以求仕途通达;敦本,即强调重农抑商,以农为本,“用本守之”;勤俭,即以“量入为出”为居家之道,提倡俭朴持家,立业永久;还报,狭义上说即重视从养育到反哺的情感代偿机制,推行以下敬上的孝道;广义上说则可以包括人与人之间的“知恩图报”以及天人之间的“天人感应”。这些价值观的核心内容其实都是责任感,概而言之就是儒家最为推崇的圣人之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一种由内而外、由小到大的责任感的贯穿。

谱牒资料对封建的伦理道德问题从细节上作出的这些限定,起到了补充国家法律的作用,并且随着谱牒的代代相传,逐渐积淀为整个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精髓。

值得提出的是,由于谱牒的修撰者多为族内精通文墨之

士或族外受尊崇的儒者,因此谱牒资料的文化含量一般较高,再加上其特有的血缘光环,使得谱牒较之其他中国传统的文化形式更具有特殊的教化功能。

谱牒精神价值中对外的方面,主要是拉近与全世界华人的血缘联系,增强中华民族的向心力和凝聚力。近年来,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在港、澳、台胞及海外华侨中掀起了一股寻根访祖热,特别是1997年和1999年香港、澳门先后回归祖国,百年国耻一朝得雪,全球华人扬眉吐气,于是归国访故者纷至沓来,寻根访祖热再掀高潮。有些族姓经过长期历史变迁、辗转迁徙,祖居何地仅凭历史文献记载已很难查找,此时谱牒资料正可以发挥出独特的作用。海外有“喜从族谱来寻根”的说法,谱牒的作用可见一斑。<sup>[7]</sup>目前,河南省博物馆《中原文物》编辑部已经成立了寻根敬祖代理服务部,组织专家结合历史文献和谱牒资料进行考证,为全世界华人的寻根敬祖活动提供查考依据和结果。谱牒资料的这种价值,恐怕是古往今来的谱牒修撰者们始料未及的。

也正因为认识到了谱牒资料所具有的这种独特的精神凝聚力,许多人已经开始采取一些更为实际的行动来表达于国、于家的一腔赤诚。以台湾为例,1949年之后,台湾与祖国大陆遭到了人为的隔离,如今半个多世纪已经过去了,许多根在大陆的台胞思乡之情日趋浓烈,为寄托这种情感,他们纷纷续修家谱,以这种方式表达其强烈的归属之愿。1977年,台湾成立了宗亲谱系学会,同年还成立了台湾省各姓渊源研究会,并出版了《台湾源流》季刊。2000年,台湾省各姓渊源研究会还协助上海图书馆举办了“跨入新世纪中国族谱国际研讨会”。可以看出,谱牒资料在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开展寻根认同、促进祖国实现完全统一方面,确实具有其它任何档案史料所不能取代的重要价值。

记录着如此丰富文化内涵的谱牒资料,实为我们民族传统文化的一份宝贵遗产。它们曾经,也必将继续对中国的文化传承、发展起着潜移默化之功。绵亘数千年的修谱活动,贯穿于整个中国封建社会,它从一个侧面展示了中国社会的发展轨

迹,是中华民族特有的历史文化现象。目前,谱牒研究在海外正是方兴未艾,在我国则处于起步阶段。分析谱牒资料的社会意义和文化价值,其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是为了更好地搞好开发利用工作,以期达到服务于社会的终极目标。如何利用好这一文化遗产,去其封建糟粕,扬其优良传统,是摆在我们面前更为重要和紧迫的一个任务。

谱牒意识的文化觉醒,将也曾风雨也曾坎坷的家族谱从祠堂供桌、老宅深院带出,步入公众视野。文化工作者应进一步挖掘谱牒资料的社会文化价值,整合全新的谱牒文化信息,充分发挥谱牒资料的多效功能,加强对谱牒资料的认识、研究、开发、利用,弘扬祖国历史文化、促进祖国统一大业,服务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进而服务于中华民族的复兴大业。

参考文献:

- [1] 韩树峰.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谱牒档案[J].档案学通讯,2000,(1):65-67.
- [2] 葛剑雄.家谱:作为历史文献的价值和局限[J].历史教学问题,1997,(6):3-6.
- [3] 常建华.论中国谱牒的社会史资料价值[A].谱牒学研究(第一辑)[C].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9:5-18.
- [4] 汪俊.略论谱牒学在文史研究中的意义[J].扬州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997,(3):62-64.
- [5] 王泉根.论姓氏谱系与中华民族的凝聚力[A].中国谱牒研究——全国谱牒开发与利用学术研讨会论文集[C].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57-74.
- [6] 邓达宏.论民间谱牒档案文献的儒家文化内涵[J].福建论坛,2003,(3):57-60.
- [7] 林其铨.家谱研究与对外开放[A].中国谱牒研究——全国谱牒开发与利用学术研讨会论文集[C].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49-56.

作者简介:王云夙(1964-),男,山东菏泽人,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图书档案学、文化遗产学;刘振华(1983-),男,山东营南人,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硕士研究生。

(上接第116页)

- [2] 中国大学图书馆馆长论坛:图书馆合作与信息资源共享武汉宣言[J].大学图书馆学报,2005,(6).
- [3] 周炜.对高校图书馆走入社会的思考[J].图书馆,2005,(4).
- [5] 马燕.从“共享文化资源、构建和谐社会”看待高校图书馆走向社会[J].图书馆界,2006,(1).
- [6] 刘清珍.高校图书馆向社会开放的必要性和可能性[J].

科技情报开发与经济,2003,(12).

- [7] 张虹.关于高校图书馆社会化服务的理论思考[J].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4).
- [8] 王璐.大学图书馆向社会开放途径分析.图书馆学研究,2006,(10).

作者简介:陈薇(1964-),女,湖南大学图书馆副研究馆员;彭一冲(1953-),男,湖南大学图书馆研究馆员。